

文史钩沉

冰心与葛翠琳：两颗纯真的心

□陈 颖

冰心（1900—1999）是享誉文坛的文学大家，葛翠琳（1930—2022）是当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，两人相差30岁，品性志趣与文学追求却颇为相近。她们由此结下亦师亦友、情同母女的深厚缘分。梳理与研究冰心文学馆所藏二人往来书信、题词手札等文献资料，冰心对葛翠琳的提携关照，以及葛翠琳对冰心的景仰敬重，可见一斑。

交往过程与情谊升华

冰心的文字影响了一代代孩子，葛翠琳也是其中之一。葛翠琳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位外乡女教师经常为学生朗读中外优秀文学作品。葛翠琳在回忆文章里写道：“读得最多的是《寄小读者》，每天读一篇……我凝神倾听着，文章里真挚的感情，优美的文字，深深打动了我的心。”女教师离校时，还送了葛翠琳一本冰心的《南归》，让她既惊喜又感动。这些经历让葛翠琳爱上了冰心的作品与文学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日后的创作风格。这个时期两人未曾见面，葛翠琳只是冰心的万千小读者中的一员，冰心则是葛翠琳的文学启蒙者与引路人。

葛翠琳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事业。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北京市文联工作，成为老舍的秘书。她跟着老舍去看望冰心，终于见到了根据读书想象过无数次的冰心。谈话间发现两人都是燕大校友，冰心亲切地拉着葛翠琳的手，一下子便消解了她初见的陌生拘谨。

这一时期，葛翠琳经常参加刚成立的中国作协儿童文学组的活动，学习儿童文学创作。有时活动结束后已经很晚了，葛翠琳就送冰心回家。在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，二人同行，葛翠琳向冰心倾诉了内心的忐忑不安，担心自己不是中文系出身，从头开始学习创作会写不好。冰心则以自身经历开导勉励她：“我刚回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祖国，要表现新的生活、新的人物，也是从这儿学起。”冰心还叮嘱她，文学创作，就要不断地寻找新的起点，不断地去熟悉新的生活、新的题材。冰心的鼓励给了葛翠琳创作的勇气与前进的方向，对她产生了长久深刻的影响。葛翠琳在晚年受访时仍感慨：“冰心的这些话，铭刻在我内心深处，一生不曾忘记。”自此，两人正式结缘，从文坛前辈与后学，渐渐变为亦师亦友的同道，为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共同努力。

在特殊动荡的年代里，二人的往来渐少，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恢复书信与日常往来。通信内容多围绕寄作品、作序题词与互报安康。令人动容的是，她们有时刻意隐瞒自己的情况，不愿让对方忧心。1983年1月10日，冰心在致葛翠琳的信中，简述自己受伤住院的情况之后，又道：“你忙吗？千万不要来看我，我还可以。”1987年1月16日，葛翠琳在信里坦言：“我住医院的时候，就很希望收到您的信。但怕您知道我生病会惦记，所以不敢写信给您。”“在医院里的时候，您的慈爱的笑容，惊人的毅力，给我力量和信心。我在医院里还完成了十二万字。您一定为我高兴的。”“我总想在春天暖和的时候，陪您在太阳下散散步，或者看看花儿……我很想念您。”为对方考虑、互相关心的真挚情谊在书信里静静流淌。

书信中的诸多温情细节，道出了二人关系的逐步升华，称谓的变化便是其一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两人通信均以“同志”相称；到了80年代中后期，葛翠琳仍保持着后辈的礼数，

以“冰心同志”尊称，而冰心却已亲昵地唤她“翠琳”或者“亲爱的翠琳”，亲近之感跃然纸上。到了1993年9月26日，葛翠琳在信里改称冰心为“亲爱的妈妈”，可见两人的情谊已超越了朋友与师生间的界限，这时恰逢冰心奖的创办与发展期间，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，精神联结也更加牢固。正如葛翠琳在2008年受访时总结：“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像师生，像朋友，也像母女。”

精神共鸣与共同追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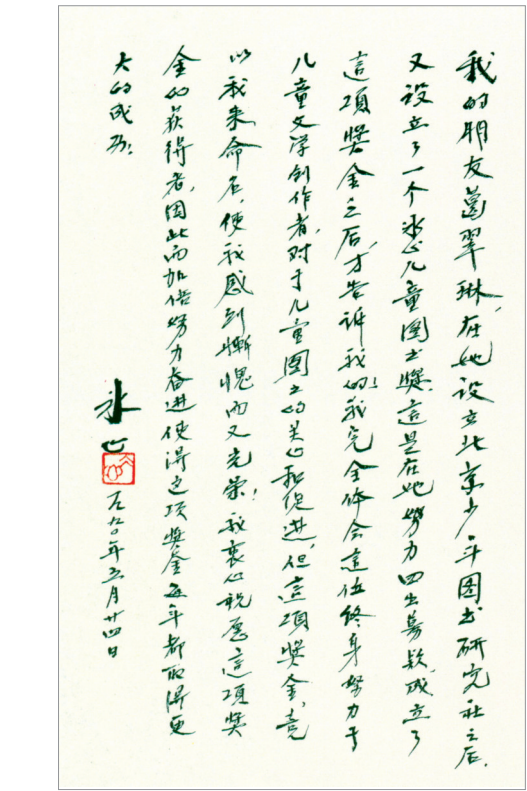
一方面是因为两人都仁爱宽厚、与人为善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两人在创作、志趣等方面较为契合，有着共同的追求，她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这份精神共鸣让两人愈发亲近。

冰心的创作始终围绕着母爱、自然与童真，她歌颂、追求真善美，以清新雅致的语言诠释“爱的哲学”，作品兼具美感与深度，如一盏闪着温暖微光、照亮前路的小橘灯。而葛翠琳的创作理念与冰心十分相近。她认为自己书写的童话应该表现美的心灵、美的情感和美的事物，创造一个美的世界。她用优美纯真、充满诗意的文字将自然美与心灵美相融合。冰心曾为她的作品作序：“我为女作家中有象翠琳同志这样的童话作者而高兴，她的作品永远是鼓励儿童前进向上。”虽然葛翠琳的作品也书写人间百态与社会问题，但归根结底，是为了让读者更珍惜、更向往世间的美好事物。

二人在为人处世上都谦逊低调、淡泊名利，在精神品格层面高度契合。这一点也反映在冰心奖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中。1991年初，葛翠琳致信冰心，请示冰心奖评委会筹建陈列室相关事宜，有同志提议放冰心的塑像与照片。5月22日，冰心在日记里写道：“下午，得葛翠琳信，还有搞什么‘冰心奖’又搞陈列，我认为不要张扬。”5月25日回信直言：“我还认为陈列室不必搞，更不必摆我的相片什么的……这样大搞不合于我一辈子的事为人，千万只把支持厂矿的大名写上就行，你说呢？”1998年，葛翠琳向冰心汇报冰心奖工作，提及拟于次年推出十周年紀念册。冰心再次叮嘱：“纪念册不要突出我个人。”“冰心奖是由关心孩子的群体构成的，我可没做什么，不能让我因此而获名。”“我一辈子的人为人你最清楚。要记住，不要突出我。说实话，在文坛上的成就，我很惭愧。”冰心始终认为个人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，自己是冰心奖事业里平凡而微小的参与者，不应大肆宣扬，这种低调真诚的态度，深深地影响着葛翠琳，让她也形成了谦和淡然的品格。

自1990年始，为了冰心奖的创立与发展，葛翠琳默默地做了大量烦琐的工作。特别有几年，冰心奖面临停办危机，葛翠琳奔走斡旋，才让冰心奖得以承续发展。而她始终自谦，自定位是“处理一些具体的事务的打杂角色”。她如此辛勤操劳，为的是“保证冰心奖的纯粹性、公正性”。冰心奖建立了严谨规范的评审程序，为的是选出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。葛翠琳曾叮嘱委员会成员：“咱们要保持低调，不要搞熟人托关系那一套。”她对纯真公平的坚守，同样受到冰心的影响，这也为冰心奖的长久存续筑牢了根基。

冰心与葛翠琳同样具备坚韧的毅力，即便遇到困难也从不屈服。抗战期间，冰心一家避居西南，住土房，吃糙米，还要



冰心关于「冰心奖」的题词
冰心文学馆藏

经常躲防空洞，丈夫吴文藻与小女儿吴青又接连生病，这个时候北新书局每月固定支付给冰心的稿费又断了，经济的窘迫更让生活雪上加霜。瘦弱单薄的冰心，用坚强的意志扛起一家的生计，以“男士”为笔名创作《关于女人》，赚取稿酬补贴家用，努力对抗着战乱与生活的压力。在特殊的历史阶段，冰心历经坎坷，但也能保持坚韧豁达的心态。晚年仍积极投身文学创作与社会事业，再次迎来创作高峰。葛翠琳曾用“玫瑰的风骨”礼赞冰心的精神风范和人格魅力。这个评价十分贴切。

葛翠琳也是如此。在动乱岁月里，她不断告诉自己“人最重要的就是，任何情况下不能灰心，不能绝望”。她努力抓住希望活下去，不轻言放弃。历经人生坎坷艰难之后，她仍然对世界充满了爱，用自己的生命与历经的苦难，一点点捻纺温暖的“玫瑰云”来创作儿童文学，献给童真的孩子们。晚年的葛翠琳受病痛缠扰，后期甚至需要依靠吸氧维持日常起居，但她坚持每天写一千余字，维持着稳定的创作水准。这份常人难以企及的坚韧，离不开葛翠琳内心坚定的理想信念，以及严于律己的品格。葛翠琳与冰心的人生姿态与文学坚守如此相似，令人钦佩。

冰心奖的坚守与传承

1990年春，葛翠琳与韩素音商议为冰心九十大寿筹备贺礼，逐渐勾画出冰心奖（即“冰心儿童图书奖”）的蓝图。同年四月，韩葛二人拜访冰心并谈及此事。4月19日，冰心在致葛翠琳的书信里，询问葛翠琳关于“冰心儿童图书奖”的资金来源与人员筹备细节，希望能够再议，并感谢她的好意。事实上，根

陈叔故事

“跟着达夫游浙江”：让文学成为脚下的路

□李飞颖

2026年初秋，浙江文学馆三楼展厅，最后一批展板正在安装。工人们调试着桂花树造型内的智能香薰设备，一股清暖温央的桂花香气，慢慢充盈整个展厅。我站在展厅中央，看着那座以《迟桂花》为蓝本打造的微型文学场景逐步成形——树冠内暗藏香薰，树旁设一古朴木案，案台之上摘录着小说原文语句：“桂花开得愈迟愈好，因为开得迟，所以经得日子久。”

这是“履痕处处——跟着达夫游浙江”专题展的入口区域。我们不想用一块传统的序言板来迎接观众，而是希望他们一踏入这个区域，就可以沉浸在温和舒缓的氛围当中，仿佛置身郁达夫笔下翁家山的秋日午后。此处入口场景，奠定了这次专题展览的整体基调，本次展览不以单向的知识灌输为目标，而是希望唤醒参观者的阅读与场景感受。

从纸面到脚下：一场文学地理学的实验

今年是浙江籍作家郁达夫诞辰130周年，我们策展的念头，始于一个朴素的问题：郁达夫之于浙江，究竟是什么？

1933年至1934年，郁达夫迁居杭州。在此之后，他开启大量外出游历活动，足迹覆盖浙东、浙西的众多地域。金华北山双龙洞，兰溪横山风景，诸暨五泄，永康方岩，江山仙霞岭，都留下过他的身影。每游历一处地点，郁达夫就会写下游记。后续这些游记文本汇总整理，汇编成《履痕处处》这部作品集。这些文字并非单纯的风光描摹，更是他半生郁结与感慨的寄托，那些他说不出口的心事，就说给故乡的山山水水。

基于以上背景，我们将本次展览定位成一次文学地理学方向的实践，把郁达夫走过的路、看过的景、写下的文字重新铺陈到一个可供参观者亲身步入的实体展览空间，让观众走进来的时候不只是在“看”展览，还能跟随展陈内容，“走”完一段属于郁达夫的游历之路。

展览的叙事结构是这样安排的。序厅搭建一个“风雨茅庐”的造型，月洞门上方挂着一块横匾，上书“风雨茅庐”四个字，门里立着郁达夫中

年时期的塑像，穿着长衫，拿着书卷，负手而立。从门洞往里看，能看到半立体的书房剪影和书架轮廓，那是他藏书的地方。据说他在这里存了近3万册书。周边配套以爬山虎、木栅栏、草地、白沙石，还有小猫小狗的造型。我们把这个序厅的时候就想好了，要营造的不是一张照片式的场景，而是一种“曾经有人住过这里”的感觉。

参观者浏览人物年表板块之后，展陈内容会引出《浙江的今古》这篇文章。我们在墙上悬挂了一张民国时期的浙江老地图，把他走过的每一个地点都标了出来。观众一站到地图前就能看到一条清晰的路径：从富春江出发，兜兜转转一大圈，最后还是回到浙江的山山水水之间。

接下来有四个篇章，共同构成展览的主体。第一板块命名为“一日一记，一城一景”，以郁达夫日记作为内容主线，展示他外出游历过程里，日常产生的感悟与片段思考；第二板块为“江山入诗，诗入江山”，围绕郁达夫在楼外楼、禅源寺、双龙洞等地点即兴创作的旧体诗展开；第三板块叫作“纸上城郭，字里故园”，以郁达夫小说作品作为内容脉络，《迟桂花》对应翁家山地域，《东梓关》对应富春江流域，《出奔》对应兰溪地域；第四板块是“履痕所至，笔锋所及”，按照不同地域进行划分，一共包含玉皇山、吴山、超山、桐君山、雁荡山、五泄、方岩、仙霞岭等14个地点，每一个地点，都搭配一篇对应的郁达夫游记文本。

每个地点我们都从郁达夫的文字里找出了最准确的那一句。写玉皇山，郁达夫用“特立独行之士，孤高傲物之辈”来形容；写吴山，他称其是“我的野外的情人”；谈及雁荡山的秋月，他写下“一处也不游，便尔回去，也尽可以交代得过去”。这些句子不是展览的装饰，它们本身就是展览的骨架。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就是让这些句子从书页里站起来，走回它们本来诞生的那片山水里去。

让文物“说话”：手稿、旧照与仿写的声音

展览光有文本是不够的，一个文学展览如果缺少实物展品的支撑，就如同人体缺少骨骼，整

套展陈架构没有办法稳固搭建。

本次专题展览，征集借用了不少具有珍贵价值的馆藏展品。展柜当中陈列民国版本的《沉沦》。这部作品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。1936年复兴书局刊印版本的《履痕处处》同样对外展出。《达夫日记集》也纳入展品行列，这部作品集，属于新文学发展史上较早出版的作家日记合集。上述展品属于文学展览当中较为常见的陈列内容。有一件特殊展品，给予策展团队更大的触动。这件展品就是《郁达夫手稿：她是一个弱女子》。这份手稿，是郁达夫留存下来唯一一份完整的手写小说原稿。当这份手稿被小心翼翼地放进展柜时，周围一下子安静了，大家都注视着那些墨迹留在纸面上的痕迹，那些笔画的轻重缓急比任何印刷体都更能让人感觉到一个有温度、有思想的人的存在。

手稿实物本身，也存在一定的展示局限。手稿是静态的，文字是沉默的。怎么让它们“说话”呢？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：在每个篇章的导语里，用郁达夫的语气写一段话，不是直接引用他原来的句子，而是模仿他的口吻重新写。以《客杭日记》为例，导语是这样写的：《“客杭日记”是我写得最短也最不像文章的日记。每天记的不过是‘今天去了哪里，今天见了谁’，像一份旅行清单。但正是这份清单，让我想起了1927年夏天在杭州的日子。最让我记得的，是那一天在白云庵月下老人祠里求的签：愿天下有情都成了眷属。”这种仿写不是要模仿他的写作风格，而是一种策展上的设计手段：借助仿写文字，重现已经逝去的作者声音。观众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，仿佛郁达夫在引导他们，他在介绍自己的作品，亦在讲述自己的生命。仿写和原文之间形成了一种对话，过去和现在之间就有了连接。

展厅内部搭建码头模拟实景，场景摆放老式木船，船只停靠在模拟水面之上，青石板砌筑的台阶向下延伸至水面，场景后方栽种数棵桉树。参观者可以步入场景当中，切身感受小说《东梓关》中轮船停靠石砌码头的情境。策展团队同步制作AI改编的文学短剧。短剧改编自郁达夫“文朴三部曲”，包含《烟影》《纸币的跳跃》《东梓关》三篇作品，剪辑生成一段四五分钟的影像短

片。短片分为“归乡”“冷暖”“静悟”三幕内容，讲述主人公文朴落魄回到家乡，内心逐步归于平和完整的心路历程。影像当中，江水缓缓流动，雾气缓缓升腾，人物衣角随风摆动，书中的文字借助屏幕影像得到二次呈现。此外还在展厅放置了一台“文学疗愈自助诊断机”，打造心灵问答互动项目，把“文朴求医”的故事转化成一个面向当代观众的心灵问诊。

同一个文学故事，展览运用四种不同的形式完成展示：手稿、造景、影像、互动。文物不再只是安静地摆放于展柜内部，它们不再沉默，而是在不同的维度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。

展览的终点，旅程的起点

每个展览都有一个终点。但我们希望这场展览的终点，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

整套展线的末尾，设置一面地图主题展示墙。墙面用手绘风格绘制浙江全域地图，地图标识郁达夫曾经到访过的地点：富阳、杭州、金华、兰溪、永康、绍兴、宁波、舟山。每一处地点标识旁边，嵌入二维码设备。参观者扫描二维码，就能参与线上投票，选出自己希望跟随郁达夫游历的地点。投票结束之后，系统结合观众选择，生成专属旅游出行方案，方案会写明可供游览的点位，适宜出行的季节，还有与之对应的游记篇目。生成的出行路线，可以直接保存到个人手机当中。

这面墙的名字叫“我想去‘浙’里”。背后的意思很简单：展览看完了，你的旅程才刚刚开始。我们不想让观众带着一堆知识离开，想让他们带着一个个具体的目的地离开。郁达夫在《两浙漫游后记》里写过：“统观两浙的山，当以自黄山西来的昱岭山脉、莫干山脉、天目山脉为主峰……我只说出了山和水都有的地方，而又很好玩的时候，就叫做风景好……照此标准来说，我在浙江，还想起富春江的山水为压卷。”我们做的这面墙其实就是一张活的地图，上面记的不只是郁达夫走过的路，还有每一个观众想去的地方。

展览的另一个终点礼物是文创布袋。袋子正面印了郁达夫手书的“我们这一代”五个字，背



冰心与冰心奖创办人韩素音（左）、葛翠琳（中）在冰心文学馆藏

据来往书信考证，创办该奖并不是葛翠琳灵光一闪的想法，早在1988年底，葛翠琳已向冰心提过此事。冰心在11月7日的回信里认为“‘冰心儿童图书奖’，可有可不可有，不必为此费太多心思”。结合信件上下文可知，当时葛翠琳刚成立两个“研究会”，也许是冰心不想让后辈为自己过于操劳，或者顾虑以自己名字冠名奖项多有不妥。但葛翠琳并未放弃这个想法，直到1990年终于有机会将其实现。

1990年5月，冰心为该奖题词：“我完全体会这位终身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者，对于儿童图书的关心和促进，但这项奖金，竟以我来命名，使我感到惭愧而又光荣！我衷心祝愿这项奖金的获得者，因此而加倍努力奋进，使得这项奖金每年都取得更大的成功！”1993年，她又为获奖者寄语：“得奖仅仅是创作的开始，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”冰心鼓励支持该奖的发展，更体恤参评者的具体情况，1998年她特地叮嘱葛翠琳：“评奖时要坚持几条：老作家让给新作者；已出版过书的作者让给未发表过作品的作者；特别注意边远地区的新作者、女作者、少年作者。”她希望冰心奖更“纯粹一些，民间一些”，做一些“铺路架桥”的工作。冰心以宽广的胸襟与长远的眼光对待每一个参评者，格外珍视每一位创作者的文学初心与成长机会。

晚年葛翠琳与小读者交流中坦言，创办冰心奖是为了“培养更好的新作者，支持好作品。把一些年轻的很好的作者都集合在一块儿，给孩子们创造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，振兴民族，让国家的未来更强大”。文坛新生作家力量，传承家国情怀，担当时代使命，为儿童文学事业、国家发展做贡献，冰心奖正是对冰心大爱无私、提携后进精神内核的赓续。

葛翠琳临终前曾留下手书遗言，向冰心奖评委会留下最后的嘱托：“冰心奖应遵循冰心先生为文学新人‘铺路架桥’的初衷，帮助他们出版和发表作品。冰心奖不以盈利为目的，不向儿童和文学作者收取费用，通过公益活动服务于社会。”葛翠琳为冰心奖耕耘操劳三十二载，直到两鬓凝霜，直到生命尽头，仍然心系这份事业，令人动容。从她唤冰心为妈妈的那一刻起，便已成为冰心的精神女儿，她坚守冰心的文学理想与人格风骨，践行冰心的嘱托，将冰心给予她的“足够的爱与半个世纪的爱”，再传递给孩子们。如此真挚而坚定的情感，跨越岁月浮沉，跨越生死界限，伴随冰心奖的发展而绵延不绝。相信二人在另一个世界再相逢，定会以含泪的微笑，牵手再同行。

（作者系冰心文学馆馆员）



“履痕处处——跟着达夫游浙江”专题展海报

面是风雨茅庐的剪影。“我们这一代”这句话是从郁达夫说的“我们这一代，应该为抗战而牺牲”里截出来的，取“代”和“袋”的谐音，意思是观众带走的不仅是一只布袋，还有一点可以随身带着的文学风骨和家国情怀。布袋用了米白色的棉麻料子，看起来朴素，也符合民国时候文人的审美。领取文创布袋的方法也简单，在出口拍一张展览现场的照片发朋友圈，配文“跟着达夫游浙江”，工作人员核验后就能领。一人一只，每天发完为止。一千只袋子就是一千颗流动的文学生种子，散布于城市的街巷与日常。

郁达夫一辈子都在“再远一程”，从富春江出发一直走到南洋。但他早就把回来的路写进了文字里——他“决心上钓台去访一访严子陵的幽居”，想把全家搬到桐君山或者钓台山附近去。肉身的归途被时代斩断了，文字的归途却始终畅通。那条“前面有一条富春江绕着”的江，是他所有作品的起笔之处，也是他提前给自己留好的最后一页。

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：让更多的人循着这些文字，重新走回那片山水里去。让每一个翻开他书的人，都成为他归途上的一盏灯。

（作者系浙江文学馆展陈外联部实习生）